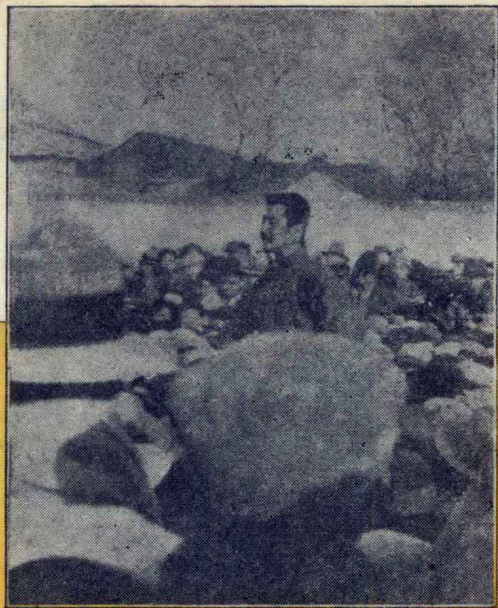




魯迅講演集

新藝出版社出版

魯 迅 講 演 集

新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魯迅講演集

新藝出版社出版

香港歌賦街十七號

大光影版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北角海堤街十八號

定價港幣二元

一九六九年四月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 錄

娜拉走後怎樣·····	一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講	
未有天才之前·····	一〇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校友會講	
無聲的中國·····	一五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革命時代的文學·····	二二
——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在黃埔軍官學校講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三一
——一九二七年九月間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講	
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五三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廿六日在暨南大學講演	

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六三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學國文學會講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六九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講	
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	七六
——一九三〇年在北大講演紀錄	
上海文藝之一瞥·····	七九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二日在社會科學研究會講	
今春的兩種感想·····	九六
——一九三二年在北平輔仁大學演講	
附錄：「魯迅的講演」（許廣平）·····	一〇一

娜拉走後怎樣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講——

我今天要講的是『娜拉走後怎樣？』

伊孛生是十九世紀後半的瑞威的一個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幾十首詩之外，其餘都是劇本。這些劇本裏面，有一時期是大抵含有社會問題的，世間也稱作『社會劇』，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 Ein Puppenheim，中國譯作傀儡家庭。但 Puppe 不單是牽線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引申開去，別人怎麼指揮，他便怎麼做的人也是。娜拉當初是滿足地生活在所謂幸福的家庭裏的，但是她竟覺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們又是

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聽得關門聲，接着就是閉幕。這想來大家都知道，不必細說了。

娜拉要怎樣纔不走呢？或者說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女人，中國有人譯作海上夫人的。這女人是已經結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個愛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尋來，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來人會面。臨末，她的丈夫說，『現在放你完全自由。（走與不走）你能够自己選擇，並且還要自己負責任。』于是什麼事全都改變，她就不走了。這樣看來，娜拉倘也得到這樣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畢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後怎樣？伊孛生並無解答；而且他已經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負解答的責任。因為伊孛生是在做詩，不是為社會提出問題來而且代為解答。就如黃鶯一樣，因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給人們聽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傳在許多婦女們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來致謝他作了傀儡家庭，將女性的自覺、解放這些事，給人心以新的啓示的時候，他卻答道，『我寫那篇卻並不是這意思，我不過是做詩。』

娜拉走後怎樣？——別人可是也發表過意見的。一個英國人曾作一篇戲劇，說一個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沒有路走，終於墮落，進了妓院了。還有一個中國人，——我稱他什麼呢？上海的文學家罷，——說他所見的娜拉是和現譯本不同，娜拉終於回來了。這樣的本子可惜沒有第二人看見，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給他的。但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裏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痺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麼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你看，唐朝的詩人李賀，不是困頓了一世的麼？而他臨死的時候，卻對他的母親說，「阿媽，上帝造成了白玉樓，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這豈非明明是一個誑，一個夢？然而一個小的和一個老的，一個死的和一個活的，死的高興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說誑和做夢，在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倒

是夢。

但是，萬不可做將來的夢。阿爾志跋綏夫曾經借了他所做的小說，質問過夢想將來的黃金世界的理想家，因為要造那世界，先喚起許多人來受苦。他說，「你們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他們的子孫了，可是有什麼給他們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將來的希望。但代價也太大了，爲了這希望，要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靈魂來目覩他自己的腐爛的屍骸。惟有說誑和做夢，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就是夢；但不要將來的夢，只要目前的夢。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麼去？倘只有一條像諸君一樣的紫紅的絨繩的圍巾，那可是無論寬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還須更富有，提包裏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

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

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

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爲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裏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後，再來聽他發議論。

所以爲娜拉計，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够爲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爲補救這缺點起見，爲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裏，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可惜我不知道這權柄如何取得，單知道仍然要戰鬪；或者也許比要求參政權更要用劇烈的戰鬪。

要求經濟權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許比要求高尚的參政權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類更煩難。天下事儘有小作爲，比大作爲更煩難的。譬如現在似的冬天，我們只有這一件棉襖，然而必須救助一個將要凍死的苦人，否則便須坐在菩提樹下冥想普度一切人類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類和救活一人，大小實在相去太遠了，然而倘叫我挑選，我就立刻到菩提樹下去坐着，因爲免得脫下唯一的棉襖來凍殺自己。所以在家裏說要參

政權，是不至于大遭反對的，一說到經濟的平均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見敵人，這就當然要有劇烈的戰鬪。

戰鬪不算好事情，我們也不能責成人人都是戰士，那麼，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貴了，這就是將來利用了親權來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國的親權是無上的，那時候，就可以將財產平均地分配子女們，使他們平和而沒有衝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經濟權，此後或者去讀書，或者去生發，或者爲自己去享用，或者爲社會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請便，自己負責任。這雖然也是頗遠的夢，可是比黃金世界的夢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記性。記性不佳，是有益於己而有害於子孫的。人們因爲能忘卻，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也因爲能忘卻，所以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的錯誤。被虐待的兒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兒媳；嫌惡學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罵官吏的學生；現在壓迫子女的，有時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這也許與年齡和地位都有關係罷，但記性不佳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救濟法就是各人去買一本 notebook 來，將自己現在的思想舉動都記上，作爲將來年齡和地位都改變了之後的參考。假如憎惡孩子要到公園去的時候，取來一翻，看見上面有一條道，

「我想到中央公園去，」那就即刻心平氣和了。別的事也一樣。

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聽說拳匪亂後，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說這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是不足爲法的，而那韌性卻大可以佩服。要求經濟權也一樣，有人說這事情太陳腐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經濟制度就要改變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其實，在現在，一個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許不至于感到困難的，因爲這人物很特別，舉動也新鮮，能得到若干人們的同情，幫助着生活。生活在人們的同情之下，已經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個娜拉出走，便連同情也減少，有一千一萬個出走，就得到厭惡了，斷不如自己握着經濟權之爲可靠。

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麼？還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而自己能牽的傀儡可以增多罷了。因爲在現在的社會裏，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這決不是幾個女

人取得經濟權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餓着靜候理想世界的到來，至少也得留一點殘喘，正如涸轍之鮒，急謀升斗之水一樣，就要這較為切近的經濟權，一面再想別的法。

如果經濟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當然完全是廢話。

然而上文，是又將娜拉當作一個普通的人物而說的，假使她很特別，自己情願闖出去做犧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們無權去勸誘人做犧牲，也無權去阻止人做犧牲。況且世上也儘有樂於犧牲，樂於受苦的人物。歐洲有一個傳說，耶穌去釘十字架時，休息在 Ahasvar 的簷下，Ahasvar 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詛，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時候。Ahasvar 從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現在還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樂的，他何以不安息呢？雖說背着咒詛，可以大約總該是覺得走比安息還適意，所以始終狂走的罷。

只是這犧牲的適意是屬於自己的，與志士們之所謂爲社會者無涉。羣衆——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齷齪，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着嘴看剝羊，彷彿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而況事後走不幾步，他們并這一點愉快也就忘

卻了。

對於這樣的羣衆沒有法，只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救，正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沈的韌性的戰鬪。

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裏來，怎麼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

我這講演也就此完結了。

未有天才之前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校友會講——

我自己覺得我的講話不能使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為我實在不知道什麼事，但推託拖延得太長久了，所以終于不能不到這里來說幾句。

我看現在許多人對於文藝界的要求的呼聲之中，要求天才的產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這顯然可以反證兩件事：一是中國現在沒有一個天才，二是大家對於現在的藝術的厭薄。天才究竟有沒有？也許有着罷，然而我們和別人都沒有見。倘使據了見聞，就可以說沒有；不但天才，還有使天才得以生長的民衆。

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裏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衆產生、長

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衆，就沒有天才。有一回拿破崙過 Alps 山，說：『我比 Alps 山還要高！』這何等英偉，然而不要忘記他後面跟着許多兵；倘沒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敵人捉住或者趕回，他的舉動、言語，都離了英雄的界線，要歸入瘋子一類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衆。——譬如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崙非有好兵不可一樣。

然而現在社會上的論調和趨勢，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卻要他滅亡，連預備的土也想掃盡。舉出幾樣來說：

其一就是『整理國故』。自從新思潮來到中國以後，其實何嘗有力，而一羣老頭子，還有少年，卻已喪魂失魄的來講國故了，他們說：『中國自有許多好東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棄祖宗遺產一樣不肖。』擡出祖宗來說法，那自然是極威嚴的，然而我總不信在舊馬褂未曾洗淨疊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馬褂。就現狀而言，做事本來還隨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國故，當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讀死書，至于青年，卻自有他們

的活學問和新藝術，各幹各事，也還沒有大妨害的，但若拏了這面旗子來號召，那就是要中國永遠與世界隔絕了。倘以爲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謬絕倫！我們和古董商人談天，他自然總稱贊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決不痛罵畫家、農夫、工匠等類，說是忘記了祖宗，他實在比許多國學家聰明得遠。

其一是「崇拜創作」。從表面上看來，似乎這和要求天才的步調很相合，其實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來思想、異域情調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國和世界潮流隔絕的。許多人對於託爾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的名字，已經厭聽了，然而他們的著作，有什麼譯到中國來？眼光囚在一國裏，聽談彼得和約翰就生厭，定須張三、李四纔行，於是創作家出來了，從實說，好的也離不了刺取點外國作品的技術和神情，文筆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趕不上翻譯品，甚者還要加上些傳統思想，使他適合於中國人的老脾氣，而讀者卻已爲他所牢籠了，于是眼界便漸漸的狹小，幾乎要縮進舊圈套裏去。作者和讀者互相爲因果，排斥異流，擡上國粹，那里會有天才產生？即使產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這樣的風氣的民衆是灰塵，不是泥土，在他這裏長不出好花和喬木來！